

居楚而楚：地理环境对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

张子璇 刘富嘉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与书法学院 山东济宁 272000

摘要：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历史悠久，渊源深厚。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区域差异巨大，对书法家的艺术感应和效果显然不同。在这种差异下，我国书法艺术自魏晋时期就出现了南北分流。本文从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地理条件、书写材料等角度展开论述，以岭南地区书法发展的基本概况为例，综合分析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书法；岭南；地理环境；人文条件；南北差异；书写材料

引言

书法作为一种以汉字为载体的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在产生之初就伴随着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早期的书法分流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分布着种类丰富的自然地貌和气候类型。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条件，南北方不同的书法风格应运而生。

一、自然地理环境

纵观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长久的，其中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是“地理唯物论”，二是“智力决定论”。“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始终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自然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智力决定论”的观点持有者则单纯的认为文化是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从而陷入唯意识论。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性，不容讨论，是谬误的^[1]。关于“地理唯物论”，在古今中外史上都记录了其形成与发展的悠久历程。如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地理环境对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影响；同时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环境地理学；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探究中西文化差异时也运用了“地理唯物论”的理论和方法。综上所述，历史的及文化的研究必须考虑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下文探讨的书法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条

件展开的。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深受独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一点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封闭性和风格的稳定性。封闭性是说书法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极少受到外来文化干扰而逐渐形成的。风格的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风格和审美观的一致性以及较低的创新频率。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书法的独特风貌。在中国书法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和”的审美理念始终贯穿其中^[2]。这种对“中庸”理念的崇尚，反映在对书法的各种评论中，例如要求点画“曲中求直”，运笔“如绵裹铁”；结构“宽可走马，密不容针”；章法“似欹反正”，“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明代书法家项穆在其著作《书法雅言》中提到：“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和之谓无过不及，和合之谓无乖无戾也。然而中和不可废，和合亦不离中和，如礼节乐和，乃其本质所在。礼过于节则严，乐纯和则淫矣，故礼贵从容，乐须奇绝而明晰。”^[3]背后的原因不仅与人文环境有关，也与中国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书法艺术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南北书派分流。清代阮元对这一时期的南北两大书法派系进行了系统、周密的研究和辨析，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阮元认为“南派”代表江左地区的风流风尚，风格疏朗飘逸、笔法精妙，擅长于简札创作，下笔简约至不可辨认……而“北派”则是承袭中原的古法，严谨而朴实，长于碑榜制作。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南北世族之间也没有相互通习^[4]。陶宏景在《论书启》中提到：“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所有好迹，皆是在会稽永和年间的佳作。”^[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南北书风的特点：

作者简介：张子璇（2004.02-），女，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书法史相关理论。

北方尚“壮美”，以碑取胜，总体风格粗犷、质朴，线条纵横自如，不拘小节而自有情趣。南方则尚“优美”，以帖为胜。总体风貌宁静秀美，含蓄隽永，用笔以圆笔为主，追求“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二、人文地理条件

在中国丰富的人文环境中，不同地域之间的书法风格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受自然环境影响，更由人文环境塑造。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的丰富多样尤为突出。

南朝时期，国家综合实力远不及汉朝，统治者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倾向于维持一时的稳定与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书法艺术也受到影响，多数书家为统治阶级，他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失去了开拓进取之风。书法与文学相互影响，南朝时期正是宫体诗盛行的时代，文学作品追求华丽精致，但格调并不高；书法作品也以秀美见长^[6]。因此，南朝的人文环境孕育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相比之下，北朝的先世久居塞北，经济文化水平很低，北朝人民一直处在战乱之中，尚武的民族性格，辽阔江域、广阔草原、容许立碑的政策，使得许多风格别具的造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书家多为学识不高的民间艺人，故书法风格粗犷、雄厚，不加修饰^[7]。

当然，任何一个地域的书风不是绝对同一的，由于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便出现了与当地群体书风迥异的作品。南北朝对峙中确实存在着相互渗透的现象。北方的郑道昭正是特殊地继承或接受了南方书风的影响而独树一帜，如《郑文公碑》；南朝的《座鹤铭》却以摩崖刻石的形式迥异于南方诸帖。即使在同一地域，由于相互交流的影响，书家的作品既有北碑的影子又有南帖的熏陶。如唐朝的虞世南等^[8]。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字如其人”的说法，字与人的对应正是字的书写风格与人的气质秉性间的关系。南北方书法家个人的气质不同，也会在书法艺术的表达中有所体现。

三、书写材料的差异对南北书法风格的影响

书写材料的多样性塑造了中国书法南北方风格的鲜明对比，形成一阴一阳、一柔一刚的美学特征，这种差异也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梁启超曾言：“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9]，精辟地指出了南北书法在材料上的主要区别，即北方多用石碑，南方则以纸张为主。

北方的气候寒冷干燥，岩石受物理风化作用较多，数量丰富且便于长期保存。因此，北方书法家偏爱使用

石头为书写材料。如秦始皇时期李斯在山东泰山上所刻的《泰山刻石》便是这一风格的典范，其作品雄伟庄严，气势不凡。除此之外，《龙门二十品》也是北方碑刻中的杰作，展现出端庄大气、刚健朴质的风格。

“帖”一词源自“巾”字，形似布帛，最初指代用帛制成的书签，后引申为书写本。在南方，河网纵横、桑蚕织造经济繁荣，书写材料由布帛逐渐演变为纸张等。相较于天然石材，帖的制作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故使用较为节约，书法艺术风格显得更为精致秀美。由于帖的材质相对柔软，其上的书法作品飘逸灵动，展现出灵动而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是南帖书法的典范^[10]。此外，书法的书写材料还深受人文环境的影响。魏晋时期南朝禁止立碑，而北朝则没有这样的禁忌，这也是北方偏好碑而南方倾向于写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南北方书法艺术在书写材料上的差异化选择深刻地塑造了各自的字体选用和书法风格。刘熙载在《书概》中精辟地指出：“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11]这一观点强调了字体的选择不仅与书写材料相关，还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北方书法中，由于碑石的坚硬质地，篆、隶、楷等字体得以充分展现其静态美。这些字体与北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紧密相连，反映了北方人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稳定迁移的精神。北方人长期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活动，这些历史背景赋予了他们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因此，篆、隶、楷字体所蕴含的静态美学，不仅与北方的气候条件相吻合，也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相辅相成。南方书法以纸质材料为主，质地更为柔软，特别适合表现行书、草书等动感十足的字体。这种字体与南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南方丰富的水资源、流动的自然形态以及鱼米之乡的生活方式，都孕育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冒险精神。行书、草书等字体所展现的动态美感与南方人民的性格和思维习惯相得益彰，使得南方人更偏爱那些强调活力的字体。南方书法在整体风格上展现出了飘逸秀丽的独特魅力。

四、以岭南地区为例分析

岭南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中原文化、广府文化、吴越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阳文化以及琼台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这种文化展现了开放和兼容的特质，强调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岭南书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先秦、西汉及魏晋时期，岭南地区便有以墨书、陶文、砖铭和木刻

等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字作品。特别是西汉时期的黄肠木刻,被视为当地现存最早的书写艺术。^[12]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岭南地区由于气候、语言、饮食、习俗、交通及生活习惯与内地有较大差异,使得当地文人大多避免追求虚名,不轻易发表言论,与内地文人之间的交往也相对较少。加之气候湿润,墨迹不易保存,因此自秦汉至元代,传世的书迹极为罕见,书家寥寥无几,仅唐代的张九龄、北宋的卢侗、南宋的刘昉和南宋的白玉蟾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清代至近代以来,岭南书法形成了帖学和碑学两大主要流派,这两大流派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

岭南地区的“帖学”流派中,黎简无疑是金石书法风潮的引领者。作为黎简的得意门生,谢兰生继承并发扬了他的书法精髓。在黎简强调“执笔最正”的理念上,他进一步发展出《书诀》,这本书深入探讨指法、笔法、墨法以及气韵等多个方面,并提出了“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的独到理论。之后,他将这一理论与笔法传给了朱次琦,继朱次琦之后,康有为接过了岭南书法传统的接力棒。康有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勇于吸收各种精华,积极倡导书法的革新之路,为中国书法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岭南“碑学”学派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吴荣光,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艺术大家,集经学、书画、金石学与收藏于一身,他不仅是“由帖入碑”的开山者,更是该流派的前驱,其影响力远及岭南地区。康有为作为岭南碑学的发展顶峰人物,以推崇碑学而轻视帖学为理念,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运用,将中国碑学书法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碑学思想不仅风靡全国,还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的书坛。他的弟子众多,包括陈千秋、梁启超、崔斯哲、罗复堪、江孔殷、康同壁、邓仲果、徐悲鸿、易宗夔、沈延毅等杰出人士。岭南书派的文化特质及其独特书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岭南独有的人文环境。这里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吸收与创新精神,塑造了朴厚大方、温文尔雅的书法风格^[13]。

岭南地区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两大书法传统:黎简、冯敏昌、谢兰生和朱次琦代表的传统,以及吴荣光、李文田、潘存、张荫桓、陈乔森、邓承修、江逢辰和曾习经所传承的传统。^[14]谢兰生、吴荣光、朱次琦是这两大传统的主要传承者,最终他们将这份技艺传给了康有

为,使得岭南书法呈现出碑帖结合的独特格局。^[15]

结语

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长久流传的艺术形式,其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风格的形成与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岭南地区独特的书风和书学脉络只是众多地域书法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一种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索出能使这门艺术持续生长繁荣的生态环境,并将各区域经过长期融合、交往后选择表现的一系列共性特质更好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 [1] 吴慧平.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M]. 荣宝斋出版社, 2009, 9: 1-36.
- [2] 吴慧平. 略论地理环境与中国书法[J]. 武陵学刊, 1996, 2: 64-68.
- [3] 项穆. 历代书法论文选(书法雅言)[M].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527-528.
- [4] 阮元. 历代书法论文选(南北书派论)[M].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630.
- [5] 陶弘景. 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启)[M].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71.
- [6]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38.
- [7] 宗白华. 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J]. 书法研究, 1983, 4: 22-24.
- [8] 董明辉、吴慧平. 试论古代中国书法与地理环境[J]. 人文地理, 1997, 6: 59-61.
- [9]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论[N]. 中国史叙论, 1901.
- [10] 张祥和、毕小莉. 地理环境对书法风格形成的影响[J]. 学术品读, 2017, 3.
- [11] 刘熙载. 书概[M].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9, 1: 221.
- [12] 兰浩. 岭南书法发展的先天性迟缓、后发性成就及当代思考[J]. 嘉应学院学报, 2024, 8: 108-109.
- [13] 黎向群. 岭南历代书法家研究[M].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8: 6-12.
- [14] 宗白华. 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 文艺研究, 1982, 2: 31.
- [15]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4: 16-17.